

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



蒙古与教廷

〔法〕伯希和 撰 冯承钧 译







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

蒙古与教廷

〔法〕伯希和 撰

冯 承 钧 译



中 华 书 局

责任编辑：陈大字



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

蒙古与教廷

[法]伯希和撰

冯承钧译

*

中华书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·8 1/4印张·165千字

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册 定价：7.60元

ISBN 7—101—01119—5/K·463

目 录

前言	(1)
绪言	(1)
第一卷 大汗贵由致因诺曾爵四世书	(5)
第二卷	
第一章 聂思脱里派之审温·列边阿答	(33)
第二章 阿思凌	(73)
第三章 安德·龙如美	(152)
索引	(235)



前 言

蒙古人西征打开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道路。导至罗马教廷向蒙古大汗的一系列遣使。教廷档案馆保留的文书，教会史书中的有关记载，都是这方面史实的鉴证，一直为学者们重视和研究。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(P. Pelliot 1878—1945)在1923年至1931年间刊布于《东方基督教杂志》第23、24、28期的《蒙古与教廷》(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)一文，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。

在这篇文章的绪言中，伯氏列举了他准备研究的十个题目，归纳起来可分两类。一类是以教廷档案中发现的蒙古统治者致教皇的文书为对象，如贵由致因诺曾爵四世波斯文答书、1268年阿八哈致教皇拉丁文书、阿八哈使臣致1274年里庸宗教大会拉丁文文件、1290年阿鲁浑蒙文信札、1291年阿鲁浑发给的蒙文护照、1304年哈赞蒙文信札等。另一类是对聂思脱里派的列边阿答、阿思凌、安德·龙如美三人事迹，以及十四世纪上半叶中国蒙古与教皇交涉的研究。实际上，伯氏此文仅完成其中一部分研究工作。即对贵由汗致因诺曾爵四世信札，和列边阿答、阿思凌、安德·龙如美三人事迹这二个课题作出说明，其他则皆付诸阙如。

这项工作，直到1945年伯氏逝世以后，始部分由田清波(Mostaert)和柯立甫(Cleaves)继续完成，他们将阿鲁浑的

蒙文信札及护照、哈赞的蒙文信札，题为《梵蒂冈秘密档案馆藏的三份蒙文文件》，发表于1952年《哈佛亚洲学报》上，并作出翻译和详尽的考释。据二氏之研究，第一份文件，所谓1291年阿鲁浑发给的护照，系对原文的误解。此护照实为旭烈兀之子及继承人阿八哈（1234—1282）所发给，日期或为1267年，或为1279年。护照提及的教皇，亦未完全确定，可能是克烈门四世（Clément IV，1265—1268），也可能是尼古拉三世（Nicolas III，1277—1280）。第二份文件，阿鲁浑的蒙文信札，是阿鲁浑致教皇尼古拉四世的。阿鲁浑（1261—1291）是阿八哈之子，仍执行其父与罗马教廷通好的政策。教皇要求阿鲁浑皈依基督教，而阿鲁浑则有礼地予以拒绝。信中维持蒙古人有信仰自由的旧法令，允许他们有选择基督教的自由。第三份文件，1302年（1271—1304）写与教皇波尼费思八世（Boniface VIII，1294—1303）的信札，要求跟教皇联军对付他们的敌人埃及的马木鲁克朝。十三四世纪的蒙文文献传世者不多，这三份文件之公诸于世，实为有益的事。此外，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（Igor de Rachewiltz）于1971年发表的《出使大汗的教皇使者》（斯坦福大学出版）一书，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个时期教廷和蒙古宫廷的关系，可补伯氏这方面之缺。

伯氏此文乃分三次发表，第一卷在1923年，第二卷第一、二两章在1924年，第三章在1931年，相隔有七年，因此前后有些地方稍嫌重复。但此文引用了大量的拉丁文和波斯文史料、教会史书以及一些西方学者写作的有关专书和论文，有不少是我们不易见到的，特别是关于列边阿答、阿思凌、安德·龙如美三人事迹的说明和考证，对中外关系史、蒙古史的研究仍

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冯承钧先生早于 1941 年就将此文译出，并交予尚智编译馆（未刊）。我们在 1954 年整理冯先生遗著时，未能找到原稿。至 1957 年始经中华书局辗转寻得，惟其中原书第 164 页第 14 行至第 200 页第 5 行之译文已不幸遗失，因此未能即时发表。冯先生在 1946 年 6 月故去，今年是他故去四十周年，特将此遗稿整理出版，作为纪念。

在整理过程中，蒙何高济同志大力协助，将原稿遗失部分重新补译。译完后，又蒙何兆武、耿升两同志审阅，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。原书中引录的拉丁文记载和信札，冯先生均未翻译，为了便于读者参考，亦蒙王焕生同志热情帮助，一一译出，在此特别说明，并深表谢意。

陆峻岭

一九八六年元月四日于北京

绪 言

一二二一年，成吉思汗(Gengis-khan)遣派的使臣 1
出现于高加索(Caucase)；两年之后，蒙古人大败斯拉夫诸王于迦勒迦(Kalka)河。一二二七年，成吉思汗死，基督教国家始稍苏息。然至一二四一年，蒙古铁骑进至西烈西亚(Silésie)同匈牙利(Hongrie)境内，须又待一死讯至，即大汗窝阔台(Ogödaï)之死讯至，才使侵略者返轡而东。西方望绝复生，乃筹防御新患之法。首欲知者，对于此类突从亚洲最远草原而来，秘不可测的游牧部落，究竟如何应付。时有流言，谓有一信奉基督教的专制君王，住在此种部落境内。所以在一二四五年春天，恰在里庸(Lyon)宗教大会行将废黜菲烈德二世(Frédéric II)以前，教皇因诺曾爵四世(Innocent IV)谘询方济各会士(Franciscaïns)同多明我会士(Dominicains)以后，派遣方济各会士约翰·柏朗嘉宾(Jean du Plan Carpin)赴鞑罗思(Russie)南部蒙古人所；别遣多明我会士阿思凌·隆巴儿底(Ascelin de Lombardie)赴镇守波斯(Perse)西北之蒙古统将处；后一奉使，年代较为不明，尤其是颇少有人研究。柏朗嘉宾同阿思凌并求大汗皈依基督之教，皆被拒绝。数年以后圣类思(Saint Louis)同威廉·卢布鲁克(Guillaume de Rubrouck)

成绩亦不见佳。可见自此时始，有一种计划发生，谋使西方基督教徒与蒙古人订立协约，甚至订立盟约。因为当时他们有一公敌，就是伊斯兰教，尤其是统治西利亚(Syrie)的埃及马木鲁克朝(Mamlouks)诸算端(sultan)代表的伊斯兰教。使臣往来，诺言交换。然而距题皆远，每次必有一方同盟者背约不赴。最后至十四世纪初年，波斯的蒙古君主正式皈依伊斯兰教以后，与蒙古连合共击马木鲁克朝的一切军事合作计划，因之预先打消。此类表面上无成绩的遣使，同此类流产的试验，要不能谓非亚洲高原同西方古交际史中之一异迹。时常有人研究，十八世纪有莫斯海姆(Mosheim)，十九世纪有缪萨(Abel Rémusat)、多桑(d'Ohsson)、大维札(d'Avezac)、玉耳(Yule)等，较近有罗克希耳(Rockhill)、戈尔迭(Cordier)、毕斯雷(Beazley)、沙波(Chabot)、卜烈(G. Pul-lé)、马兰(Malein)诸君等，更近则有穆尔(Moule)同戈鲁波维次(Golubovich)二君，而我亦在研究之列。研究似已详尽。新近的寻究又在教廷档卷中发现若干惊人文件，如柏朗嘉宾携回之大汗贵由(Güyük)致因诺曾爵四世的答书原本，同波斯蒙古人的蒙文信札数件。教廷监事默尔卡蒂(G. Mercati)主教，经狄斯朗(Tisserant)主教的好意介绍，切嘱我在《基督教东方杂志》(Revue de l'Orient chrétien)中将此类文件，以及若干研究附带问题之文悉数刊布。本编分为数卷，历述下列问题：

(一)贵由致因诺曾爵四世波斯文答书，钤有贵由蒙文印玺(一二四六年十一月初间)；初通波斯文之读者是马燮(Massé)君：

(二)聂思脱里派(Nestorien)之审温·列边阿答(Siméon Rabbanata),安德·龙如美(André de Longjumeau),阿思凌三人事迹;

(三)阿八哈(Abagha)致教皇拉丁文书一件,题一二六八年;业经狄斯朗主教刊布;

(四)阿八哈使臣致一二七四年里庸宗教大会拉丁文文件;此件乃经道院长薄格觉(Borghezio)发现通知;

(五)阿鲁浑(Arghun)蒙文信札一件,题一二九〇年; 3

(六)阿鲁浑发给之蒙文护照一件,题一二九一年;

(七)哈赞(Ghazan)蒙文信札一件,题一二九一年;

(八)(九)聂思脱里派总主教雅巴刺哈三世(Mâr Yahbalahâ III)阿刺壁文信札两件,题一三〇二同一三〇四年,经狄斯朗主教翻译刊布;畏吾儿文印文经我翻译;

(十)对于十四世纪上半叶中国蒙古人与教皇交涉之若干新的说明。注一

注一 我曾在考古研究院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日,二月十七日,七月七日等会议中将教廷文件发现事声明;此外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四日会议中言及列边阿答(参看《考古研究院报告》〈Comptes rendus de L'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〉一九二二年刊第四一页,五二至五三页,二三四至二三五页,二六八至二六九页)。最后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五院大会中对于《十三四世纪教皇与蒙古人》(Mongols et Papes aux XIII et XIV Siecles)曾作简单之说明,其后连同当日宣读之其他记录一并刊布。

如许卷帙，尚未能将我所裒辑之簇新资料尽量包容，是皆足以使人详悉十三四世纪中亚与东亚基督教状况之文献也。可是其他文件泰半涉及聂思脱里派，而且写以汉文。注二我拟在别一文中详细说明，顾资料太多，恐延展时间甚久。

注二 关于此类文件者，我曾在《中亚与东亚之基督教徒》(Chrétiens d'Asie Centrale et d'Extrême-Orient)一中文节略言之，已在《通报》(T'oung Pao)一九一四年刊第六二三至六四四页发表(案：此文冯承钧已译，见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》第四九至七〇页)；其后所得之资料不少。

第一卷

大汗贵由致因诺曾爵四世书

(一二四六)

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于一二四五年四月十六日离里庸,适当六月二十八日宗教大会在此城筹备开会之前。^{注一}他持有致“达达国王人民”信札一件,题三月五日,或为三月十三日之误。^{注二}因诺曾爵四世责蒙古破坏屠杀之非,劝其悔过,措词自难使之接受,但教皇措词实务求温和,并愿获有一种协议与一种协定。此书几全属政治性质,并未要求大汗皈依基督教。然除此交与柏朗嘉宾之«Cum non solum»(不仅)信札外,同日或八日前(假定此书作于三月十三日),因诺曾爵四世又有一致“达达国王人民”之«Dei patris immensa»(主之无限之)信札,应由方济各会士罗朗·葡萄牙(Lauren de Portugal)携往,此书仅言宗教,欲劝受书者领洗。

5

注一 参看大维札《柏朗嘉宾修士蒙古记》(Relation des Mongols ou Tartares Par le frère Jean du Plan de Carpin)收入《地理学会刊行之行记记录汇编》(Recueil de Voyages et de Memoirs Publié par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)第四册,一八三九年刊第四六